

在谦卑和宽广中显现力量

□李林荣

2014年的散文,仍游走出没于文坛边缘,扮演着年度文学大戏里兢兢业业而又毫不起眼的配角。但尽管如此,全年超过300种的散文类图书的出版量,报纸和杂志数以千计的散文篇章的发稿量,网站、微信等新媒体平台上层出不穷的散文和散文家的页面推介,依旧在多方面地显示着散文稳定的社会亲和力和传播热效应。当然,与往年一样,报刊、图书和网媒所传布的散文,是古今中外的合流,年度新作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这一小部分,正需在此给予全面详察。

检点20多种文学刊物,汇齐2014年新发表的散文1000余篇。通读比照之下,70多篇作品脱颖而出,取材和写法都各有夺目的亮色闪现。同时,2014年散文创作总体流派的一些特点,也清晰展露出来。

中、长篇散文受到持续推重

新世纪以来中、长篇散文走热的趋势,在2014年益趋加强。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致力于中长篇散文创作,并在中长篇散文创作上取得了重要收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学刊物也开始常设栏目,力推单篇万字左右的散文作品。

老牌散文名刊中,容量相对丰厚的《美文》,已将长篇散文、中篇散文、短篇散文三分天下的栏目框架主体固定。综合性文学刊物中,继近年一向重视中长篇散文的《收获》《当代》《中国作家》《花城》《天涯》《长城》《钟山》之后,《西部》《山花》《作品》《作家》《延河》《民族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江南》《黄河》《文学界》,甚至《小说林》《小说界》在2014年也都为中长篇散文提供了很多机会。其中,《西部》的表现尤为活跃,它通过“西部头题”、“跨文体”两个栏目具体主题的灵活设置,推出大量高品质的中长篇散文作品。王必胜的《读写他们——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通篇4万余字,以解读书信为经,以汇聚思绪为纬,追溯20年前的往事,牵连出当年文坛人事的诸多生动细节。

习习的《南方工厂——一个写作者由远及近的观察》以近3万字的篇幅,平实呈现作者到东

新世纪以来中、长篇散文走热的趋势,在2014年益趋加强。传统写法的短篇散文也取得了多样化的好收成,在个别怀旧类作品中,甚至还偶尔出现篇幅扩张现象。

演述历史散文在2014年持续发热的同时,人文地理书写的新潮流开始消融历史演述的旧套路,2014年中长篇散文最丰硕的成果,正集中在这里。

莞一家民营电子制品厂住宿舍、访工友、下车间的见闻。其中的洞察和思考尽管尚欠深入,但仍见惟亲临现场才能有的一分细腻感和真切感。于是的《六小时》从作者深夜寻找走失的父亲这一极度焦虑、仓皇的情境着笔,在2万多字的篇幅内,用绵密的叙事和刻画,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由小见大,由己达人,将自我的遭遇一路推展,直抵老龄化社会的危机,给读者带来一种在压抑和窒息中感受生活真相的精神触动。

格致1.4万字的《满语课》和近2万字的《手语,鱼缸中的南海》,也是年度长篇散文中值得瞩目之作。前者写作者对满语教师与满语课堂的期待、搜求和探访,凸显了作者眷念和追索自己民族文化根脉的情结。后者生发于作者某次潜水体验时从教练那里遭受的一个疑似暴虐的凶狠手势,主题情调与作者十多年前的成名作《利刃的语言》相似,但语体技巧更加汪洋恣肆,展示出的理性思考也更加斑斓幽微。

人文地理书写消融历史演述

从作品数量上看,新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演述历史散文在2014年持续发热。同时,人文地理书写的新潮流开始消融历史演述的旧套路,2014年中长篇散文最丰硕的成果,正集中在这里。黄金明的《河流的忧郁》、于坚的《盐津的蜂蜜》、叶广岑的《秦岭动物札记》、王明明的《一个伐木时代的终结》、鲍尔吉·原野的《草的汗香》、杜怀超的《草蔓延》《草江湖》、李亮的《农具之锈》、简默的《路上的它们》、拜学英的《我的拜家

村》、郭雪波的《科尔沁大青沟峡谷纪实》、杨献平的《时间之心》《南太行民间叙事》、赵树义的《街边的橱窗》、张承志的《海上的棋盘》、祝勇的《隔岸的甲午》、陈丹燕的《镜像》、余泽民的《我在匈牙利的诗生活》、云也退的《我的以色列农耕日记》、马丽华的《喀喇昆仑以南》、闫庆梅的《寻茶去》、赛娜·伊尔斯拜克的《梦幻贝加尔》,均属此类。

上述作者当中,张承志、马丽华、鲍尔吉·原野、叶广岑、陈丹燕、于坚、祝勇在散文或其他体裁中,早有依循人文地理和地域文化的维度进行创作的实践。而其他多数作者涉足人文地理书写的时间起点,都在近年。人文地理书写在散文创作中的兴盛,远溯可与游记散文的悠久传统相关,近究则源于全民化旅游的生活时尚。

细读作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的重心和支点,并不落在传统游记散文以交代游踪、描绘景致为双轨的方向上,而是叠合、聚焦于作者个人一定时空条件下独异的精神历程。更直接地说,人文地理书写瞄准的是化外在于内在、转客观为主观的心灵史,而非止步于田野作业和民间考察的风物志,是只有借助特殊的历史、地理因素才能激发得更敞亮、更鲜活、更直观的作者本人的内心动态,而非简单投射在作者心目中 and 文笔下的、点缀了些许零碎、浮表观感的自然风光。

正因此,人文地理书写在处理历史素材时,总是释放出强劲的主观能量。不仅作者创作当时面对着原生态的历史、地理素材,要焕发出飞扬跋扈、舍我其谁的清气,而且读者阅读时,同样也能从历史、地理的意境中领受到一种既凌驾其上、又留连其间的洒脱和愉快。知性体悟的穿透

力,决定着文本成品的总体格调;情感传达的分寸感,决定着文本成品的审美境界;意念呈现的精准度,决定着文本成品的语言质地。

新一代散文作家蓄势集结

散文的创作革新向来步履迟缓,并且难得出现风起云涌、群体聚集的热闹场面。上一次散文创作生力军的集结亮相,是上世纪90年代初以《上升》《九千只火鸟》《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散文卷》三本散文合集为标志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的崛起,距今已相隔20余年。纵观2014年文坛,新一代的新生代散文家队列,已日渐凸显分明。

论年龄,他们并不像“70后”、“80后”作家群那样齐整,他们当中不乏横跨散文、小说、诗歌的多面手。无论是与20年前的新生代散文家群体相比,还是与近前的“70后”、“80后”小说家或诗人群体相比,如今这些年龄分散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新生代散文家,在看似相悖的两个特点上体现着突出的一致性:一面是个人的创作已有多年坚实的积累,一面是在评论界和读书界尚未赢得足够的关注。

除了前文提及的杨献平、杜怀超、黄金明、李亮,在2014年有散文精品发表的新生代散文家还有《我的大学》的作者彦妮、《破碎的记忆》的作者杜中伟、《贫瘠之地》的作者阿乙、《青鸟(外二篇)》的作者玄武、《渐行渐远的故土》的作者吴佳骏、《词语中的生活》的作者夏榆、《食鼠之家》的作者羌人六、《寄居者》的作者江少宾、《七个我》的作者闫文盛、《纸琥珀》的作者谢沁立、《新疆年轮》的作者朱又可、《那年的阳光》的作者袁士勇、

《南方叙事》的作者张谋、《碧蝉花》的作者东珠、《在暴雨中所显现的》的作者苍耳、《父亲的骂声》的作者帕蒂古丽。

展现在这些作品中的语篇风格和精神内涵,几乎没有可以归并于一的显著相似点。但在各自不同的面向上,它们都同样沿着从惯常的生活经验表层中发掘隐含的疑问、惶惑和纠结的情思轨迹,尽力于修辞的洗练、叙述的明快、细节的精当、旨趣的精粹。其中,彦妮、羌人六、阿乙的作品取材和表达的独到力度,江少宾、谢沁立、夏榆作品视角和结构的新颖别致,格外可赞。

短篇散文从传统格局再出发

在中长篇散文逐渐占据文学类书刊大量空间的同时,2014年的短篇散文继续凭借作品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作者群的庞大规模悠然前行。2014年,传统写法的短篇散文新作不仅并不鲜见,还取得了多样化的好收成,在个别怀旧类作品中,甚至还偶尔出现篇幅扩张现象。

马识途以《百岁拾忆》为总题的15个系列篇章,忆述浩劫年代的亲身遭际,以朴实的文思,尽显见证历史的一腔急切。吴平安的《窑洞房的主人》,记叙了遗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疆大学校园里的温情一页。贾宏图的《春天的回忆》,召回了消褪在黑龙江知青营地的一段新时期文学的史前史。彦火的《寂寞如斯赵清阁》、梁秉堃的《小势可造,大难难违——记命途中的于是之》、吴泰昌的《记叶圣陶与巴金二三事》、黄毓璜的《〈雨花〉人》、兴安的《说不尽的刘恒》,基于亲历亲闻,钩沉人事,洞幽烛微,增益了当代文艺史上的关键细节和立体画面。

此外,薛尔康的《第四条诫命》和韩少功的《革命后记》从日常认识入手,陈说社会政治伦理奥义,举重若轻,抽丝剥茧,颇见新意。刘元举的《大白菜》质朴晓畅,自然圆合,在看似平易的形式中,回归传统散文外松内紧的地道本色。而刘亮程的《驴知道世界上的路》《五个人叫买买提》和周晓枫的《耳语》则以简约的篇幅,浓缩呈现了极简主义的归真派和重度装饰的巴洛克这两路新散文名家的创作风貌。

个人价值被重新定义和发现

□纳杨

大影响。从中可以看到汉语教学对新疆各民族发展的影响。

用心行走的历史和人生

历史人物、事件的追思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内容。回顾历史,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前人足迹,汲取先人精神能量,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启发当下,谋划将来。

周立民的《槐香入梦》重述甲午海战、日军侵略历史,提出记住不为复仇,重在知错而改,不再重犯。作者没有陷入历史的旋涡,而是客观、清醒地回顾历史,还原真实,为今天提供经验和建议。江子的《督陶官:唐英的手腕》讲述历史人物唐英如何将景德镇打造成富有艺术气质的瓷都,作者带领读者跟随唐英的脚步,感受一个辉煌时代的开启和落幕。

个人回忆文章可看作另一种历史书写。作家写史更注重“人”的感受,而作家回忆自己的人生往事,更是为历史的书写补充了鲜活的注脚,增添了人文气息。雷达的《黄河远上》写儿时求学经历。作者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他的求学经历过特殊的历史价值。作品从孩子的视角出发,以求学的经历为线索,串起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另一篇作品《多年以前》既是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也是对父亲母亲的重新认识。余秋雨的《祭笔》以一支笔为线索,讲述自己在文学道路上的求索,分享其中的欢乐与苦涩,失去与收获。北岛的《旅行记》把人生比作一次旅行,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而一个人的世界有多大就看心能走多远。

作家在回忆往事的同时,也在回顾着心的旅程。梁鸿的《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更偏重思考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联的问题。社会背景在个人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只有脚踏实地地去体会当下社会,真正进入当下人的生活,才能看清所处的社会。

如果人生是一段旅程,有的人是用心在行走,有的人是用脚在行走。2014年,一部分散文作家把亲身经历的异国风情用文字记录下来,为我们打开另一扇窗。

阿航的《番邦客》讲述“我”在欧洲国家的中餐馆打工的经历,此外还写到他所遇见的那些在国外淘生活的中国人的境况,他们对生活的安排和理解,他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求,让我们领略到不一样的人生。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用画家文笔写自己对国外某些人生智慧信条的困惑,作者坚持独立思考,让人印象颇深。

此外,2014年还有几篇记人散文很有特色。铁凝的《天籁之声 隐于大山》写作者当编辑时与作家贾大山交往的一些片段。作者在回忆自己倾心敬佩的文学大家贾大山时充满了敬意,在叙述中与读者一起感受着文学大家的人格魅力,感受这种人格的力量如何化为文学的力量。陈文芬的《远东图书馆师徒列传》讲述的是瑞典远东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讲述瑞典汉学家们为中国文学的研究与传播所作的努力,从中可以领会他们对文学的态度以及作为学者对研究的态度。



■微批评

一位脑瘫患者,身在寂寥乡村,背负苦命运,却渴望着《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如果没有这些噱头,广大群众自然无暇在百忙之中拨冗前来读诗。围观,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网络生活当中,早已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性景观和文化现象。让围观者最高的两种情况无非是:好久好久;好惨好感人。多年来,诗坛一直兢兢业业地向围观者输出好久好二的梨花体、乌青体,此次余秀华横空出世,强烈扭转了围观者对诗歌的阅读期待,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萧雨桐

2014年的散文创作形态更加丰富、情感更加充沛,作家们的视线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写作直达人的内心深处。其中最动人的,是作家用真诚的写作分享对人生的体会。

2014年的散文创作,是作家们为读者奉献的一场精神盛宴,细细密密的文字里潜藏着的是一个大大的、实实在在的“人”字。随着“中国梦”的提出,“个人”、“国家”被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奋斗被鼓舞,个人的成功被赞扬,“个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和定义。散文创作也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的写作路径,一是保持了传统写作特质的文化视角写作。这类作品有着文化散文的气度和格局,有着丰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底蕴,是作家思考的结晶,承载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另一个方向则是平民视角写作,以普通人的心态和视角来看社会、看人生,写感悟、写情绪。这类作品更加突出“个人”,代入感强烈,容易引起共鸣。

近距离观察身边的农村

中国的农村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这种变化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经历了最初的震荡后,作家们开始把目光从远方收回,回到当下,近距离观察和感受身边的农民。王月鹏的《血脉里的回望》讲述了作者在望庄拆迁工作组的一段经历和思考,用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心态来看待一个当下非常普遍的现象——农村拆迁。作品中对人心的思考深入而独到,引人深思。朱强的《墟土》写故乡的最后一块处女地终于没能摆脱被挖开重建的命运,而与其相关联的小城历史也只能在县志里沉寂。作家一方面感叹面对乡村的转变只有观看和目瞪口呆的权利,还有悲伤和流泪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也充分理解小城里热切盼望变化的人们。

铁穆尔的《蓝翅膀的游隼》关注现代游牧民族的生存变化。作家用深沉的笔调提醒我们,游牧民族与草地的关系就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一样深入骨髓,而他们也同样正在经历撕裂的疼痛。冯秋子的《草原上的农民》讲述了被贫穷所困的草原农民不惜忍受自然环境的折磨和人们的恶意防范而偷偷进入草原“搂地毛”。作者亲身探访搂地毛的草原农民,倾听他们的讲述,用平视的目光观察他们的无奈境遇,让人感触良多。

赵瑜的《乡村闲窥》不是回乡偶书,而是置身

其中,讲述既现代又传统的当下农村中人们生活的变与不变,外部世界和人们的生活习惯有所改变,但一些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比如情感方式、处世基本原则,其实一直没有改变。崔东汇的《马年耕田》把回老家过年称作“耕田”,是作者在亲戚中耕耘“心中之田”。作品对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在农村的沿袭和固守的发现与思考,对于我们理解农村变化、寻找改变途径有一定的意义。

“人”的变化是写作的重点

作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变化总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和较多的思考,而“人”在这些变化中的种种反应总是他们目光的出发点和终点。李存葆的《龙城遐想》从出土恐龙化石的“中国龙城”写起,写恐龙化石的发掘,想象远古时期恐龙的生活景象和世人关于恐龙灭绝的种种猜想,引出“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大变异、大恶化,是恐龙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一共识。文章由远及近,由虚到实,验证了这样的观点: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心态是人类如何生存下去的关键,可谓思之远、情之切。

郭文斌的《认识我们的心》从心之好恶讲到心量的边界,再讲到舍与得,回答了如何保持本质状态的生命,活出生命意义的问题。毕淑敏的《恰到好处和幸福》同样充满了追寻生命本质的温暖力量,是用作家的心智和眼光去理解幸福的奥义。

东西的《经验在最深入》思考作家与媒体的关系。现代传播技术的飞快发展,让人们来不及去消化所获得的信息,盲从、亢奋成了习惯。这种影响也同样辐射到了作家身上,面对信息的轰炸、社会情绪的裹挟,作家该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东西看到了独立思考可能被消弭的危险,他真诚地写出了自己的心,希望引起人们的重视。

王必胜的《单位》从作者自身经历写起,以作者的工作单位发生的变化为依托,直言快语,条清晰,写出了“单位”的今日往昔,触及社会顽疾,引人深思。“单位”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个范围极广的单位不明人群,他们应以何种身份参与社会生活,他们的基本社会保障如何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

路也的散文《墓》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內容,是作者关于生死的思考和感悟。文章写作者所到过的历史人物的墓地,回望先人的人生际遇,感慨今日人们的遗忘,而这种遗忘,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遗忘,如果继续遗忘,我们可能会失去宝贵的精神遗产。

陈漠的《跨文体名字》从不同语言对植物的称谓写起,揣测人们给事物命名的初衷,记述关于名字的趣事,想象独特,开启心智。帕蒂古丽的《词语带我回到喀什葛尔》也是从语言的角度讲述民族文化。作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细腻体察,切身感受到语言对反映一个民族情感方式的特殊价值。艾克拜尔·米吉提的《父亲的眼光》写不会汉语的父亲凭着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决定让儿子学习汉语,而这一决定对儿子的人生产生了重